

# 关于性工作者的瑞典模式的真正影响

## #2

### 买性法律的影响：街头性工作和性工作规模

## 买性法律的影响：街头性工作和性工作规模

### 介绍

在本工具包的第一份文献中，叙述了对瑞典将买性进行刑事定罪及其背后的理论根据的批判是如何被消声、被破坏和被排斥于瑞典和国际的争论之外。这种消声处理，有利于支持买性法律一方的游说。支持方还表示，这个法律是成功的，对性工作者的生活没有负面影响。

本文突出的是买性法律对性工作者生活的一些影响。尤其是街头性工作者，受买性法律影响最大的性工作者，同时也是最贫困最需要服务、保护和帮助的。而他们得到的不是支持，而是压迫与刑事定罪。本文也涉及了法律是否实现了其废娼（或是在一定层面上减少了性工作）的目标。<sup>1</sup>

本文可作为工具，用以质疑那些声称买性法律取得成功且没有负面影响的论点。

### 对买性刑事定罪没有产生负面影响吗？

在采纳瑞典模式国际呼声日益增高的情况下，法律是否有负面影响，是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当法律在1999年开始实施时，瑞典国内的争论中，有人表示担心会导致性工作转入地下并变得更危险。为了平息这种担忧，当时强调法律不会带来负面影响。实际上，当时强调，法律只是对嫖客定罪，性工作者本身是受到保护的。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在瑞典，性工作者和其他相关人表明，性工作者在竞争增加的环境下，面临更多困难，因为他们和客人谈判的能力被削弱了。法律实施之前的担忧变成了现实。

### 街头性工作的竞争加剧

在买性法律的实施中，瑞典警方将重点放在街头性工作和疑似的贩卖人口（经常仅仅因为性工作者是外籍）。因此，在1999年法律实施后，客人对在公共场所买性感到更加紧张，使得在公共场所买性的人数明显减少。<sup>2</sup>

由于街头买性的人减少，仍在街头的性工作者的客户群就缩小了。这些性工作者由于缺乏资源、时间和金钱，没能转为离开街头通过手机和网络出售性服务。而他们通常是最需要通过性工作挣钱，去抚养子女或购买酒精/毒品。他们继续采用能立刻拿到钱的方式性交易。

因此，他们被迫提供一些以前不会提供的服务，才能获得足够的报酬；而且，更难以拒绝之前会拒绝服务的客人；同样的服务，很难拿到与之前相等的报酬。瑞典南部的马尔默娼妓工作组的社工指出：

“街头买性的客人变少，但女人们还是需要钱去买海洛因，所以客人们给的钱变少，但要求变多，比如不用安全套……但是，真的需要钱，又已经在街头站了一宿，瘾头又要上来了……就可能答应”

（采访，2010，社工，马尔默娼妓工作组）<sup>3</sup>

因此，买性法律给了性工作者的客人更多权利，却削弱了街头性工作者的权利。对那些因警方打击而从街头转入更隐蔽地方工作的性工作者，隐蔽也意味着远离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司法保护。

本文可作为工具，用以质疑那些声称买性法律取得成功且没有负面影响的论点。

1 买性法律的间接后果，即对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的观点和政策的影响，将在工具包的第三份文献中讨论。另外，还有其他法律政策可用于针对性工作者的，这在第四份文献中讨论。

2 在法律开始实施时，网络 and 手机越来越普及，很可能街头性工作的减少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法律的实施的共同作用。

3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Routledge)

性工作者只能用更少时间去评估客人的潜在风险，商讨服务内容和报酬。

## 与客户谈判的困难

由于客人是被定罪的对象，在街头买性的人都担心被抓。这意味着，街头性工作者与客户谈判的时间更少，为躲避警方查问，很快就上了客人的车或与客人离开。因此，性工作者只能用更少时间去评估客人的潜在风险，商讨服务内容和报酬。

**“20秒，1分钟，2分钟，你必须决定是否要上这个人的车……如果我站在这儿，对方会害怕接我，而会招招手说‘过来，我们到拐角那边去再谈’，这会很危险。”**

(采访，2010，性工作者[网络，伴游，街头])<sup>4</sup>

**“女人们说，法律让这行业变成了买方市场，因为法律，她们必须动作快……所以，当客人一打开车门，你就要跳进去，但你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采访，2010，社工，马尔默娼妓工作组)<sup>5</sup>

除了仓促的谈判，更少客人愿意给性工作者身份信息。这种信息可以是性工作者的保险，因为这些给了这些信息，客人行为不端、虐待或暴力，性工作者就可以报案，或威胁报案。由于买性被定罪，那些坚持要客人提供身份信息的性工作者的可选对象就更少了。急需用钱的人就不得不冒更大风险，服务匿名客人，否则挣钱的机会就很少：

**“我以前工作时尽力保证安全，不想冒险。但现在客人们都很害怕…他们都用匿名的号码。如果你接了匿名客人，就可能被抢劫。在上一次被抢后，我非常痛苦……就不再接任何匿名号码了。所以，现在我的来电也不频繁了。”**

(采访，2009，性工作者[街头，伴游，网络])<sup>6</sup>

由于买性被定罪，担心被认出或被逮捕，这使得客人即使目击性工作者被虐待或发现有人口贩卖嫌疑的行为，也不敢去报案。性工作者和相关人员表示，他们的客人即使很担心所看到的事，也不敢报案。有个目击过疑似虐待和人口贩卖的客人这样说：

**“(如果去警方报案)他们就会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不会因为这个被抓，但我还是会被记录，那如果我哪天再出现……要避免这种事。我在论坛上发了贴，说‘这是人口贩卖’。”**

(采访，2011，性工作者的客人)<sup>7</sup>

4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Routledge)

5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Routledge)

6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Routledge)

7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Routledge)

**完全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瑞典性工作者规模整体缩减了。**

## 瑞典性工作的规模缩小了么？

很明显，买性法律的实施存在着负面影响。2010年瑞典政府对法律进行评估，以对如何更有效地实施而不是法律本身提出改进意见。即使在这份评估报告里，也提出，性工作者在工作中感到更多困扰和压力。<sup>8</sup> 政府报告指出，性工作者可能会发现生活更困难了，但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就是这会让人离开性行业。这跟保证法律不会有负面后果可差太远了。它的意思是，瑞典性工作者的生活越困难，就会有更多性工作者离开性行业。看来无论买性法律带来什么后果，都可以看做法律的成就：当提出法律时，他们说不会损害性工作者，而且被看做这个法律与其他方案相比的最大优势；现在法律明显给性工作者带来困境，就诡辩说这应当被看做法律的效果。这种不断变化目标手法，是为了推广这项意识形态化的危害性的法律。

尽管很多性工作者的生活变得更困难，但完全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瑞典性工作者规模整体缩减了。

如上文所述，买性法律的实施带来了街头性工作的明显减少。<sup>9</sup> 这被瑞典模式的支持者当做法律在减少性工作方面的明显成功。

但是，街头性工作只是性工作的一小部分，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所以街头性工作的减少不能代表性工作的整体减少。由于瑞典性工作绝大部分不是在街头，这几乎不可能做准确估测或进行趋势判断，更别提趋势的因果关系了。正如瑞典国家卫生福利委员会所说，不可能确定1999年法律实施后是否改变了性工作的整体规模。

**“这个，很难判断有什么明显的改变，卖淫的规模是多了是少了？我们不能给出确定的回答。”**

(瑞典国家健康福利委员会 2008:63)<sup>10</sup>

另外，甚至不能说街头性工作的减少是永久的。在1999年法律实施了一段时间后，街头性工作者又增加了。一些相关人士表示，今日的规模与1999之前记录的相当。还要指出，一些街头性工作者在法律实施后转入室内工作，这种转变不能代表性工作规模的减少。

8 SOU, 2010:49,《禁止购买性服务评估 1999-2008》(斯德哥尔摩：行政事务办公室)

9 应当强调，对性工作具体规模的估测，无论结论是增加还是减少，都是极度不可靠的。因为刑事定罪和污名造成性工作转入隐蔽的环境。

10 瑞典国家健康福利委员会, 2008, 瑞典性工作2007, 链接: [http://www.socialstyrelsen.se/lists/artikelkatalog/attachments/8806/2008-126-65\\_200812665.pdf](http://www.socialstyrelsen.se/lists/artikelkatalog/attachments/8806/2008-126-65_200812665.pdf) (2013年9月30日最后登陆)

## 总结

买性法律及其直接负面影响有明显因果关系。

- 买性法律针对瑞典在街头的性工作。
- 因此，更少客人愿意在街头买性，担心被捕。
- 一些性工作者离开街头，继续工作，这使得他们远离服务机构和保护。
- 继续在街头工作的性工作者通常是更穷困的，没有能力离开街头工作。
- 继续街头工作的性工作者不得不接受更少的报酬，而提供更多的服务，客人减少，竞争增加，使服务价格下降。
- 客人害怕暴露身份被捕，性工作者，无论是否在街头工作，都更难与客人谈判，获得客人身份信息。
- 这将性工作者置于危险与暴力之中。由于害怕被捕，也使客人不愿报告可疑的虐待与剥削。
- 法律让客人有更多权利，却损害了性工作者的权利。

买性法律的负面影响反被当做一种成功，声称通过增加性工作者生活的困难，促使人们离开性工作。

尽管法律的推广者们声称法律保护性工作者，声称法律使性交易减少，但没有证据显示人们因为法律而停止了性行为的买卖。没有证据显示法律减少了性工作。性工作更多发生在隐蔽的地点。而急需收入的性工作者冒了更大的风险，工作也遇到更多困难。

总之，瑞典模式在两个关键点上受到质疑：

- 1 瑞典模式没能实现降低瑞典性工作规模的目标。
- 2 瑞典模式增加了性工作相关的危险与困难。

**瑞典模式增加了性工作相关的危险与困难。**

---

## 相关阅读

本工具包的四篇文献来自于作者 Jay Levy 博士于2008-2012年在瑞典的研究。完整研究参见：

- Levy, J., 2014,《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Abingdon: Routledge)

除这本书外，一些重要文献可供参考。

关于瑞典性工作规模的讨论，对瑞典模式直接成果的分析，参见：

- Kulick, D., 2003, 《新欧洲的性——对嫖客刑事定罪与对插入的瑞典式恐惧》人类学理论3: 199-218
- Levy, J. and Jakobsson, P., 2014, 《瑞典的废娼论与法律：对瑞典性工作动力和性工作者生活的影响》，犯罪学与刑法 doi: 10.1177/1748895814528926

- Östergren, P. and Dodillet, S., 2011, 《瑞典式买性法律：声称的成功与被记录的效果》，发布在“国际工作坊——性工作去罪化及更多：实践经验和挑战”，海牙, 3-4 March

- Östergren, P., 2004,《性工作者对瑞典的性行为买卖政策的批判》，链接：[http://www.petraostergren.com/pages.aspx?r\\_id=40716](http://www.petraostergren.com/pages.aspx?r_id=40716) (2012年3月31日最后登陆)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mailto: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http://www.nswp.org)

NSWP is a private not-for-profit limited company.  
Company No. SC349355

**BRIDGING THE GAPS**  
Health and rights  for key populations